

深读·调查

2010年5月13日,人类成功登顶道拉吉里峰50周年纪念日。就在这一天,中国一支民间商业登山队登上了这座海拔8167米的世界第七高峰,8名队员全部登顶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,这都堪称一次壮举!

然而,一次完美的登山,绝不仅仅是登顶这么简单,安全下山才是完美的必要条件。这支登山队体验登顶快感不到24小时就失去了3条生命,他们的名字值得我们记住:李斌,赵亮,韩昕,其中韩昕是山东淄博人。

时隔一个多月,关于这次山难的原因,媒体和网友仍然在争论不休。我们通过采访亲历者,试图还原韩昕的登山全过程,以此表达我们对一位登山者的尊敬,并且希望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示。

一位完美的登山者 一次不完美的登山

道拉吉里峰。 东方IC供图

●记者手记

山永远在那里 生命只有一次

本报记者 蔡旭超

李斌的氧气早已用尽,体力彻底衰竭了。他躺在雪地上,说:“好冷呀,不走了。”然后一口气变成半口气,最后彻底没了气息。李斌遇难后,全身开始浮肿,指头肿得戒指都撸不下来,最终队友解下他的项链当做遗物带了回去。

赵亮依然在独自摸索着下山的路,由于缺氧意识开始变得模糊,当他试图攀上一块岩石时,夏尔巴人将他喊了回来。在返回的过程中,赵亮突然滑坠跌落山谷,踪影全无,什么东西也没留下。

韩昕在雪坡上熬了一夜,精神终于支持不住了,他眼前出现幻觉,开始发狂,竟然卸下了自己的背包、氧气、雪镜,甚至是冰爪、手套!韩昕在通过山脊时滑坠了50米被岩石卡住,等夏尔巴人前去施救时,他已经遇难。

怀揣高山梦

当我再次遇到韩昕时,他已经是一名资深驴友,声音洪亮,身材也变得魁梧厚实。我当时在想,这就是那个偶尔会在胡同口遇到,背着一个绿色画夹,瘦瘦的、酷酷的、整天做着美术梦的男孩吗?

——王兵,韩昕小时候的玩伴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淄博总工会宿舍楼,到了夏日的夜晚,这里就成了一帮1970年前后出生的半大小子的乐园,但韩昕的身影极少出现在他们之中。韩昕更多的时间是在家里画画,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艺术家。

小时候的韩昕早早就具备了一些艺术家的气息,成熟、稳重、有主见。所以当韩昕的妈妈总是叫他“小昕”时,很多朋友,甚至连他的哥哥都喊他“老昕”。这样的性格气质一直伴随了韩昕终生。

从山东艺术学院毕业后,韩昕在一家公司从事广告设计,几年后转向户外用品的经营,开始了他的登山生涯。韩昕为什么要登山?在周围人的眼中,韩昕是一个完美的人,坦率、豁达、热心、有责任、敢担当……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人,别人眼中的完美也意味着内心深处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酸楚。韩昕就是这样一个人,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我想,高山冰雪上肯定有另外一个我在等我。”这也是所有登山者的情怀。

从2007年攀登玉珠峰开始,韩昕先后攀登了慕士塔格和雀儿山,今年他选择了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。于是韩昕就成为了淄博登山界当仁不让的旗帜和领袖,这也使得他的背包里多了一些登山之外的东西。韩昕曾解释过为什么会选择这座山峰:“登山不仅仅代表你自己,出去登山你代表的是一座城市的形象与实力。每次与北京、上海、深圳,成都这些大城市的山友交流时,我在他们面前确实有点骄傲,因为登山彰显了淄博的实力和社会影响力。”

痛苦大本营

在长达7天的徒步进山过程中,会路过许多尼泊尔小山村,我们在一个村子里买了一只山羊。这只羊赖皮得很,不肯往前走,朝它的屁股上猛踹两脚才肯挪动一下。我们用了3天的时间将这只羊带到了山脚下,在意大利营地将它宰着吃了。

——郑向峰,登山队领队记者。

韩昕在去攀登道拉吉里之前,曾找人卜了一卦,结果是他两年内

漫长的等待更是对他们的考验。登山队于4月18日到达BC,5月1日尝试冲顶失败,一直等到5月13日才获得冲顶的机会。在这20多天的时间里,队员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干,天天望着道拉吉里峰,觉得山都变小了,仿佛跨几步就能登上山顶。此时带来的蔬菜、肉都已吃光,只剩下方便面和罐头,队员们的体质开始变得虚弱,最后派夏尔巴人出去买了两只活羊回来才解决了燃眉之急。

韩昕在BC表现出了一个登山者的理智和忍耐,他只给妻子打了一次电话,说了没几分钟就挂掉了。“我不能打电话了,我怕会控制不住

个半小时。

下午1时,队伍开始下撤。“我x,这坡怎么这么陡啊!”下山的时候,张伟骂了一句。当下降到8100米时,攀登队长张伟突然滑坠,一口气到了7950米处,幸亏氧气瓶从背包中掉出来制住了。一名夏尔巴人发现了张伟,将他带回了C3。

除了饶剑锋和另外一名夏尔巴人在前面下撤,韩昕等6名队员都停下来不敢乱动,这一停留也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。此时天色渐晚,气候也开始变化,云雾突起并飘起了雪花,天地间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,分不清方向。

由于体力原因,楼国龙和李斌结组下撤。他俩的氧气在登顶的时候就几乎用尽,到最后都走不动路了。楼国龙很幸运,在路边竟然捡到一瓶近乎满格的氧气,“看来老天不想让我死啊!”楼国龙仰天大笑道,然后他就拖着李斌往下走。当下降到7600米处时,李斌的体力彻底衰竭了,他躺在雪地上说了一句:“好冷呀,不走了。”然后从一口气变成半口气,最后结束了生命。

当楼国龙解下跟李斌连接在一起的安全带时,捡到的氧气瓶不慎掉落谷底,“我x,老天就肯让我多活一个小时啊!”此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,队伍还在摸索着回家的路。晚上9:30左右,领队杨春风由于体能透支在7450米处滑坠,后来被上来接应的夏尔巴人发现,用绳索拖回了C3。在杨春风滑坠后不久,赵亮也接着滑坠了,他跌落山谷之中,踪影全无。

其余3名队员再也不敢走了,他们在7400米处的一个雪坡平台上呆了一晚上,等待救援。这是漫长而痛苦的一个夜晚,零下几十摄氏度的气温几乎置他们于死地,身体状况尚可的韩昕为队友们做着按摩,以防止他们被冻僵。14日早晨,张梁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,他决定独自下撤,这其实是一个赌博,而他幸运地回到了C3并活了下来。

韩昕也决定去山下探路,他对躺在地上走不动的楼国龙说:“老楼啊,你表现很不错啊,下山后让我那小兄弟好好采访采访你。”韩昕跟楼国龙要了包方便面,然后往山下走去。楼国龙此时筋疲力尽,昏昏沉沉地继续睡了,没过多久,韩昕也因滑坠遇难。

一名夏尔巴人说,他看到韩昕意识模糊,在经过一段山脊时脱下了身上的东西,滑坠了50米被岩石卡住。当夏尔巴人回去取了绳子前去营救时,发现韩昕已经不行了,于是他带上韩昕的背包、氧气等物品将楼国龙救了回来。

韩昕之死是最为蹊跷的:东西都还在,人怎么没了?假如韩昕滑坠后遇难,夏尔巴人或许可带走他的背包氧气,但没有任何理由取下他的手套、冰爪、雪镜等物品,韩昕如果意识正常的话,那他绝不会自己卸下这些保命的装备。“韩昕精神崩溃后自己脱下了身上的东西。”这或许是唯一合理的解释。



5月13日,队员们在成功登顶后合影。(张伟 摄)

不宜远行,他笑了笑,并没有相信这些“怪力乱神”的东西。出发前,韩昕的妻子对他说:“你登山我不反对,但从这次以后,不管你登哪座山我一定要跟着你。”

韩昕于4月9日抵达成都报到,与其他6名队员汇合:赵亮,李斌,张梁,楼国龙,饶剑锋,张平(化名)。再加上领队杨春风,攀登队长张伟和随队记者郑向峰,这支10人的队伍随即飞往加德满都,开始了境外登山之旅。

杨春风,张平等4人决定乘坐直升飞机进山,而韩昕等6名队员和10名夏尔巴人协作则是从BENI小镇徒步进山。道拉吉里峰位于尼泊尔的最西端,徒步要走7天才能够到达,虽然7天的徒步很漫长,但清秀的风景和队员之间的说笑倒也使得旅途不那么寂寞。他们途经一个村子买了只山羊,一路将它赶到山脚下,在意大利营地宰杀炖了。“现在看来,在山脚下杀羊,似乎并不是一件吉利的事情。”郑向峰回忆时说道。

登山队将BC(大本营)建在了海拔4611米的地方,虽然海拔不是很高,但环境十分恶劣,李斌刚到达大本营时遭遇高反,呕吐不止。整个营地都是建在冰川上面的,队员们在帐篷底下铺了三层垫子,一觉醒来腰部依然发凉,他们将所有的衣服套在身上还是感觉冷。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,队员们的体力只有消耗,而没有得到有效补充。

BC环境的恶劣只是一个方面,

自己的情绪。”他说道。

冰峰24小时

“老楼啊,你表现很不错啊,下山后让我的小兄弟好好采访采访你。”他跟我要了一包方便面,然后就往下走。这恐怕是韩昕生前的最后一句话了。

——楼国龙,登山队幸存者之一。

在BC苦苦等待了20多天后,登山队终于等来了机会,他们从瑞士购买的天气资讯显示,5月13日顶峰天气状况良好,而这一天恰巧是人类登顶道拉吉里峰50周年纪念日。登山队8名成员(张平中途退出,郑向峰不参与攀登)随即于5月10日从BC出发,当天到达5810米的C1(一号营地)。

韩昕跟随着队伍一起艰难地往上爬升着,呼吸越来越急促,脚步也越来越沉重。前两天长时间的攀爬,加上陡峭的雪坡、无处不在的冰裂缝和不时滚下的落石,几乎将队员们的体力消耗殆尽。从C2开始,领队要求队员们使用氧气,韩昕知道不能够对氧气形成依赖,于是他将出氧量调到最低,而体力下降严重的李斌则将氧气开到最大。在氧气的帮助下,队伍最终按计划达到了C3。

5月13日凌晨,登山队开始从7350米的C3向顶峰发起冲击,预计时间是12个小时,实际上花费了13

韩昕已经走了,我们不想给他冠以“英雄”、“勇士”之类的称号,就像他生前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。他只是一名爱山之人,一名值得尊敬的登山者。

记得一位登山家曾说过:没有任何一座山峰值得你付出生命,因为山永远在那里,而生命只有一次。这次山难,给了我们再次思考国内商业登山所面临的问题的机会。

商业登山不是洪水猛兽,而是大势所趋,是促进中国登山事业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。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是,如何完善商业登山的细节,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。

从道拉吉里登山队伍的组成来看,每个队员都曾登上过7000米级的高峰,领队杨春风也是国内著名的高山领队,这支队伍看起来似乎具备了攀登8000米级山峰的实力。但山与山之间是不同的,道拉吉里是一座技术型山峰,并不适合商业攀登,但他们还是去了。

我们假设一下,如果登顶前领队杨春风设定关门时间并严格执行,或许不能够登顶,但起码能让所有队员安全返回。再假设一下,如果所有队员和协作人手一部对讲机,或者是GPS导航仪,并且在大本营留下一名指挥调度者,或许就不会存在摸黑找路的情况了。

而实际上,整个队伍只有4台对讲机,山下只留下两名夏尔巴厨师,而没有指挥调度人员。虽然杨春风设定了12个小时的冲顶时限,但并没有严格执行,实际上花费了13个半小时才登顶。杨春风说:“我要是不让他们登顶,他们能把我给生吃了,我毕竟收了他们的钱。”

我没有任何责难杨春风的意思,因为这次山难毕竟是一件不可预知或者说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事故。杨春风是一名纯粹的登山者,他的理想是让中国的商业登山达到或者超过西方的水平。

这是“杨春风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”的第一笔买卖,每人10万元的登山费用也基本赚不到什么钱,而这次山难对杨春风几乎是个灭顶之灾。他已经身无分文,就连直升机救援的3万美元费用也是中国登山协会出的。山难发生后,杨春风也几度想到自杀,但他的朋友要求他“像男人一样站起来”。

高山服务公司的资质认定、高山领队、向导的资格认定,山难发生后的责任认定,这些目前在中国登山界都是空白。西方的登山运动经过200多年的发展才达到现在的高度,中国的商业登山之路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